

论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

孙 立 平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十年来,在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正在形成一种对现代化的整体性认识。即使是专注于研究某一个专门领域的现代化的学者,也不得不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研究付出很大的精力。因为如果不对现代化的总进程有必要的了解,要充分认识某一个方面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①

如果现代化确实是一个由许多方面的内容构成的一个整体,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由许多个子过程构成的总体性过程,那么,就有一系列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第一,如果说现代化是由许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整体,那么,在这些不同的内容或因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是合谐的、能够互相容纳的,而不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

第二,如果从理论上说现代化是一个有机的总体性过程,那么,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会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的完美过程吗?如果不是,那么实际上是怎样的情形?在现代化的诸因素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顺序关系模式(或称之为时序模式)?

第三,如果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全球性进程,那么,在其不同的阶段上,不同因素的地位与作用会有何变化?

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现代化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而且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实际推进现代的伟大事业,都有着根本性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将概括地对第一个问题,即现代化的不同内容(或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第二和第三两个问题将另外行文讨论。

在逻辑上可以将本文看作是《现代化内容刍议》一文的续篇。在那篇文章中,笔者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城市化、组织管理现代化、社会结构、文化和人的现代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七个方面对现代化的内容进行了论述,并对每一个方面所包含的具体因素进行了概括的分析。在本文中,为了使论题更为集中,我们将从这些方面中提出七个因素来,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七个因素是:经济增长、收入平等、政治稳定、政治民主化、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城市化。在这七个因素中,经济上有两个(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政治上有(两个政治稳定与民主化);社会方面有三个(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城市化)。社会方面的因素较多一些;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经济和政治方面涉及较多,而对现代化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则较弱。同时也必须说明的是,如同在《刍议》一文中的分析那样,这七个因素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现代化所涉及的因素是众多的,但在一篇较短的文章中要讨论这些因素的关系,就不能不将讨论限制在有限的几个因素及其关系上。

^① 笔者本人在这方面的看法见拙著《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第一章;《现代化内容刍议》,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一期。

二、从和谐论到冲突论

事实上,在现代化研究的初期阶段,和谐论是许多学者和理论心照不宣的一种共同假设。当人们论述现代化的总体性和综合性的时候,当人们批评片面的“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并强调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当一些学者提出“现代工业文化复合体”^①的时候,当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设计“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的时候,也就往往意味着现代化所包含的各种内容之间是和谐的、互容的、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同时相配合,任何一个特定方面的现代化都不可能顺利进行,也不可能成功。

将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看作是互容的、甚至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获得多方面的进步。即所谓“好事将会一起来”(all good things go together)的假设。对这种关于现代化诸因素的和谐论的观点的形成,至少可以注意到如下几点。第一,这种和谐论的思想是与人类的理想相一致的。自从人类文明形成以来,历代的思想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描述和追求人类的理想境界。尽管每个人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富裕、平等、自由、尊严,一直是这种追求中的永恒主题。这种理想社会是一个“各方面都美好”的社会。可以说,人类思想史上的这种遗产,对和谐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二,从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似乎可以证明现代化的这种和谐的图景。特别是如果人们注意到最初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对西欧和北美现代化经验的总结上这一点,这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日本似乎也是一个例证。另外一个常被人们引用的例子是哥斯达黎加。在1948年革命之后,哥斯达黎加建立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民主政府。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其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一个较高的速度。同时,土地占有相对来说也是较为平等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收入分配渐趋平等。^②第三,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的“消极和谐”(negative compatibility)现象,似乎可以作为和谐论的反证。这种“消极的和谐”是指,由于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不能顺利进行,同时也就制约或阻碍了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其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均未获得成功的进展。这种“消极和谐”现象似乎可以从反面证明在现代化的诸因素间存在的不可分割、互相制约的关系。

但是,对和谐论人们必然注意到其理论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缺陷。这就是,除了反面的例证之外,其正面的论点似乎都只能用很长时间跨度的过程来支配。以作为和谐论立论基础的西欧、北美和日本的现代化而论,虽然将其几百年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总的过程似乎可以证明和谐论的观点,但如果以较短的历史跨度作为标准,或干脆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来看,人们所能看到远不是这样一种和谐的情景。以增长和平等的关系来看,西欧和美国在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确实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趋势,但在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则是经济增长与高度的不平等相伴随的。以致库兹涅茨也只能用U型曲线的理论来概括这种现象。再如日本,其经济现代化是开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而政治民主化的任务则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提上日程,而且还主要是由于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外部因素的介入。因此,即使是从这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其长期过程的“最终”和谐

^① 哥迈尼:《现代化的社会学》,Transaction Books, 1981年。

^② 亨廷顿:《发展目标的发展》,收于维纳尔和亨廷顿主编的《理解政治发展》一书, Liff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第7—8页。

也伴随着短期过程或特定阶段的不合谐。而后者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有着更为直接的意义。

随着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中所面临的坎坷与困境，使和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在这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如下两点。

首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消极因素。“现代化所伴随的却是人类业已看到的巨大的灾难。”“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①布赖克认为，在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中，最严重的就是社会解体。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是整合的，体制运行是有效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比较一致的，暴力与动乱被控制在较低的程度。但是当迅猛的变革到来之时，社会中没有任何两个因素能以同样的速度适应这些变革，全面失调开始出现，广泛的暴力开始爆发，大批民众开始迁移，正常的管理已不可能。这样，一个国家就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入现代化的阵痛中。此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原有的价值系统的动摇与瓦解，社会成员会处于无所适从和无规范可循的失范状态。而现代生活造成的人本身的异化，更是为许多学者所经常话及的。因此，布赖克指出：“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举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②

其次，现代化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矛盾与冲突表现得更为突出。概括地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增长与平等的矛盾。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过程的时候，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就是，其自身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一开始就将经济增长作为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是可以理解的。按当时“间接流下”的假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平等的问题也就自然可以解决。但事实却是，在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获得较为可观的增长的同时，收入平等的趋势并没有出现，反而却出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而且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恰恰是力图用扩大收入不平等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因为他们认为，收入的不平等会有利于资本形成。^③第二，是民主化与政治稳定的矛盾。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稳定是人们公认的政治现代化的两个重要指标。开始的时候，有许多学者，特别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这两者是可以互容的，甚至可以互相促进，更具体地说，政治民主化可以促进政治稳定，因为民主化可以提高人民对政权的认同程度，扩大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但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所呈现的却远不是这样一种合谐的图景。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初按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不仅在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发展上显得无能为力，甚至连社会秩序也无法维持，频繁的社会动荡使这些脆弱的民主政权纷纷垮台，结果在许多国家中取而代之的是同样没有希望的专制政权。新保守主义对此的解释是，政治民主化会对政治稳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民主政治会引发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并增强人们的挫折感。第三，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矛盾。在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家看来，社会分化既是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整个现代化能得以推进的不可或缺的机制。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原来承担综合性职能的结构体分化为若干个分别承担专一功能的子结构，

① 布赖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37页。

② 同上。第38页。

③ 详见拙著《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54—63页。

这无疑会大大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但社会分化的过程必须伴之以相适的整合或再整合过程,以协调分化后的各子结构体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会发生社会结构失调。但从现代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来看,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步推进、相得益彰的。实际的进程往往是,分化超前而整合滞后,结果就是社会结构的失调和社会问题的大量出现。^①第四,是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60年代以前,在学术界中,对于城市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虽然有的人也对城市化所带来的某些弊病颇有微词,但对其积极作用都是承认的。但60年代中期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②却给这种理论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这种“过度城市化”不仅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积极的作用,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并造成各种社会问题。

于是,和谐论被冲突论取而代之。在冲突论中,“两难窘境”、“扶持”、“交替换位”等,成为引人注目的谈论话题。

三、中介变数问题

从理解现代化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看,无论是和谐论和冲突论,都可以给人以有益的启发。但同时也不能不说,这两种理论还都是很不完全的。因为现代化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为了进行下面的讨论,对这种复杂性我们首先可以指出如下两点:

第一,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性质会有明显的不同。在现代化的诸因素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数量是非常之大的。即以前面确定的 n 个因素来说,也可以排列组合成 2^n 种关系,而这些关系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有些关系的性质比较容易确定。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较为确定的正关系(或积极影响)。如社会整合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就是一种较为确定的正关系。因为社会整合程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为政治整合奠定基础,而且也可以通过消除由社会结构失调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而缓和社会危机,从而为政治稳定的实现创造条件。此外,如政治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社会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另一种是较为确定的负关系(消极影响)。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较为勉强地说,收入平等对经济增长往往会表现为一种消极影响。但这只是就两者的直接关系而言的,并且需要限定许多条件。如果将其间接影响也考虑在内,结论就不会这样简单。比如,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往往会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这是在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中经常见到的现象。^③再有的一种较为确定的负关系就是社会分化对社会整合的影响,一般地说,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总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原来的整合状态,并提出重新整合的要求。但必须注意到,无论是比较确定的正关系还是比较确定的负关系,都是就单向关系而言的。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都是双向的,这就形成一种可能,即在A和B两个因素中,A对B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而B对A的影响则可能是消极的,或呈现为其他类型的影响。比如,政治稳定会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反过来,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有利于政治稳定。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环境中,经

^① 对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及结构失调的系统论述见斯梅尔瑟《变迁和适应变迁的机制》。收在霍塞·利茨和莫尔编《工业化与社会》一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3年。

^② 见拙著《社会现代化》,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10—411页。

^③ 这里所说的收入平等是仅指收入而言,并不包括“机会均等”之类后加的而又无法量度的内容。

济增长会对政治稳定产生不利的影 响。这种现象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因为许多所谓现代化的“阵痛”、“困扰”和“两难窘境”就是由此形成的。

还有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或现代化的特定阶段中）才能确定。比如，在理论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政治民主化会有利于收入平等的实现，而专制主义则往往与高度的收入不平等相联系。一般地说，这是不错的，无论是用较大的时间跨度去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还是来分析某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现实，似乎都可以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但这种关系并非总是如此的。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其民主化的初期阶段并不是与经济上的收入平等相联系的，相反，倒是与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相联系的。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并不奇怪的。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看，取代王权专制统治的，并不是广大民众都能参与政治活动的民主政治，而是经历了一个所谓“精英民主”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政治参与的权力附着着种种限制条件。这些资格限制包括居住资格的限制、财产资格的限制、教育资格的限制、职业资格的限制、性别资格的限制等。由于这一系列的资格的限制，实际上真正能够参与政治活动的，只是贵族和新兴的资本家与商人，下层老百姓仍处在政治参与的大门之外。由这种民主政体所制订的政策，当然有利于上层社会。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达到了最高点。由此可见，民主对平等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很模糊的、很难加以确定的。从理论上说，现代化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之间都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但确实有一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晰。如社会整合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政治稳定与社会分化的关系等，就属于这些情况。

第二，同样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的性质。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6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东亚的部分国家与地区，一是拉美的部分国家。在这两个部分中，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在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这两个部分的经济增长都是相当迅速的，但在拉丁美洲，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则在不断拉大，以致于有人说，拉丁美洲是世界上除南非以外最不平等的地方。但东亚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则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

再如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60年代进行的许多定量研究都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民主化会有一种明显的积极影响。比如，在1963年库特里特用统计分析表明，教育、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与政治发展的相关程度比较接近，系数在0.69到0.74之间。而大众传播与政治发展的相关系数为0.81。如果把这四个因素合到一起，再对其与政治发展进行多元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高达0.82。^①在1968年，欧尔森所进行的研究，^②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政治学家利普赛对这种关系的解释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与保健、教育、文学、大众传播、收入平等、中产阶级规模的发展相联系的，所有这些都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③然而这种影响无论是在拉丁美洲和东亚似乎都很难明确地看到这种关系，特别是在东亚。

① P.库特里特：《国家政治发展：量度与分析》，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8卷第2号。

② M.欧尔森：《国家政治发展的多变数分析》，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3卷第5号。

③ 利普赛：《民主的若干社会条件》，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2卷。

正是由于同样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条件下所呈现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国家中,现代化因素的组合模式便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组合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第一种类型为西欧、北美现代化初期阶段的组合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较高的社会分化、较为适应的社会整合、适应的城市化。其中,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并存的局面是与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不介入经济活动的政策直接有关的。第二种类型为日本和德国的现代化模式,与第一种模式相比,区别主要在于在工业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政治,社会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失调现象也更为突出。帕森斯认为,没有进行相应的民主革命,是这些国家后来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①应当说这有一定道理,但原因实际上更为复杂。^②第三种类型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概括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收入较为平等、政治较为稳定、专制统治、适度的社会分化、高强度的社会整合、适度城市化。第四种类型是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概括为较快的经济增长、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专制统治、政治动荡、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社会整合程度较低、过度城市化。当然这四种类型并不能将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概括进来,但只是从这四种模式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异。

以上两点给人们的启示是,现代化中任何因素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其关系的变化,也并不仅仅取决于两个因素自身的性质。因此,要了解现代化诸因素的关系,就必须将对这种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中介变数考虑在内。近些年来,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这些研究证明了中介变数在确定现代化因素之间关系性质方面的重要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前所述,大量的跨国统计分析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民主化有一种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民主政治并无任何进展,相反倒实行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专制统治。一些历史比较研究也指出,一些国家在两次大战期间民主政治的中断,仅用经济社会是解释不了的。^③于是,有些学者提出了“相对阶级力量”和“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强度”两个概念,以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研究的结果表明,从“相对阶级力量”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时也与这个国家的阶级关系模式有关。在一些国家中,大土地所有制占据支配地位,这样,国王、依附型的资产阶级就会和大土地所有者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反民主联盟,从而使民主政治难以推进。相反,在小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反民主势力则很难从农村中找到同盟者,民主联盟则较容易建立。正是在这些国家,民主政治能得以进展。但仅仅用“相对阶级力量”来解释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够的。民主政治的实际进展还与“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强度”有关。在民主政治得以进展的地方,一般都是社会力量较强,而国家力量较弱。而在拉美和东亚,则基本是强国家、弱社会。国家高度垄断着权力和资源,民间力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微乎其微。^④

民主政治和政治稳定的关系也绝不象自由主义者或新保守主义者预言的那样简单。西比斯用跨国统计分析的结果否定了在民主政治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一种直线性关系的观点。他

① 帕森斯:《社会体系》,自由出版社,1951年。

② 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第一版。

③ 奥登尼尔:《现代化与官僚专制主义》,伯克利,1973。

④ 莫则利斯:《准边缘地区的政治:巴尔干和拉美的早期议会主义和后来的工业化》,麦克米兰,1986。

的研究结果表明,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与政府对不稳定因素的反应形式有关。^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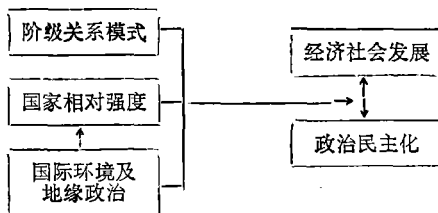
因此,为了更为确切地了解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必须对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关系的中介变数做进一步分析。

四、作为中介变数的背景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因此,其现代化诸因素的关系必然受到其国内既有条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时空地位的影响。一般地说,这种影响是客观的、既定的。这种作为中介变数的背景因素主要包括:

1. 国际背景与地缘政治。现代化从一开始,就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孤立变革过程,而是带有明显的世界性。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然要受到这个总体背景的重要影响,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国家中所呈现的特点,也往往与这个国际背景有关。

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一些早期研究者设想的那样简单,而是呈现为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摩尔等人分别分析了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强度对这两者



之间关系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如果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国内特定的经济社会与阶级结构,而且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的性质以及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状况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之间形成强烈对照。^②在起步较早的内发型现代化国家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开始建立。这些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国际秩序的建立者,而面对的则是一个相对软弱的世界。加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在民间开始孕育的,国家在现代化中所担负的责任非常有限。所有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使这些国家在现代化伊始,就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虽然这并不直接意味着政治民主化,但却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余地。而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情况则与此不同。这些国家大都有被殖民主义奴役的历史,即使是在获得民族独立以后,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也仍然存在,在不平等的国家经济政治秩序中,他们所处的是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同时,软弱的国内资本也不可能与强大的外国资本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要顺利地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就必然要求

^① D·西比斯:《群众政治暴动:一项跨国因果分析》,纽约,Wileg,1973。

^② 关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概念见宋书伟、孙立平、严立贤《走向现代之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171页。

强大而有效率的政治。使政府成为发展和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者和组织者。在较为成功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强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权、政府经济发展的干预,几乎成为通例。虽然集权并非就意味着专制,^①但由于政治建设的主要精力是用在强化政权上,为民主政治的建立留下的余地也就很有限了。这样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如东亚和拉美)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相当成就的时候,其政治民主化却大为推迟了。

在国际环境因素中,地缘政治的作用需要加以特别的强调。现代化的剧烈变革,现实利益的尖锐冲突,使这几百年间的国家间的冲突与以前的时代相比,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周围的环境的状况如何,面对的是和平共处的邻国,还是与邻国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也会对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中诸因素间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仍以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为例,有大量的例证可以表明,如果在将其他条件限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所处的是一种较为和平的外部环境,其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就可能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提高,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所处的是一个严重对立的外部环境,即使是在经济社会较为顺利发展的情况下,民主政治也难以获得实质性的进展。

2. 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变革浪潮,将世界上几乎所有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卷入到这股历史潮流之中。但人们必须注意到的是,所有这些民族和国家是带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被裹挟到这次浪潮中来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不同的起点之上开始现代化的进程的。对此,艾森斯塔德尖锐地指出:“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问题。”^②

对此,艾森斯塔德将不同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分为如下类型:①西欧:在现代化之前就有发达的封建或专制国家;②东欧:在现代化之前,政治上高度独裁,从社会的角度看,城市化的水平较低;③美国和英属第一批自治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是经由殖民化和移民过程而形成的。其中有的源于强烈的宗教动机,由宗教的拓殖团体所组成,而其余的则多半基于大规模的移民,目的在于寻求经济机会和更大的地位平等;④拉丁美洲:较为支离破碎的现代结构出自寡头政治的殖民征服社会。在该社会中,居征服者和寡头地位的白人与土著居民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隔阂;⑤日本:现代化起源于一个略具独特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⑥中国:是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帝制,即一种基于特殊类型的“绅士—官僚”制度崩溃后形成的;⑦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社会:现代化过程开始于殖民体系之内,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在亚洲)以原有较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社会和完整的文化宗教传统为基础,而另一部分(特别是在非洲)则主要建立在部落的结构与传统之上。艾森斯塔德的分析对深入研究不同国家现代化的起点,是很有用处的,但从我们这种研究的需要来看,艾氏的划分未免过于繁琐。为了分析现代化起点对现代化诸因素之间关系的影响,我们可以将现代化的起点分为两个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在较为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包括欧洲国家、大多数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部分中东国家。第二种类型是在较低的农业文明甚或前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部分南亚国家以及拉美和中东的个别国家。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起点,对现代化进程有着全然不同的意义。从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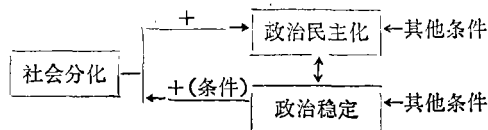
① 见拙文《集权、民主、政治现代化》,《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页。

说，现代化工业文明是与发达的农业文明相衔接的。也就是说，现代文明所必需的许多条件是在发达的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在当今世界中，虽然由于国际间的互相影响，一些处于较低农业文明甚或前农业文明的社会可以在外部因素的推动下强行启动现代化进程，但现代化的一些基本条件的缺乏这一事实，却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可以改变的，而这正是困扰着目前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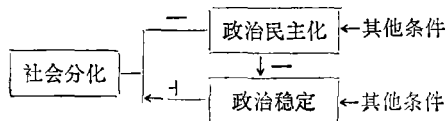
在这些基本条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较小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并逐步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从而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现代化的历史则表明，能否在现代化开始之前或启动初期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前提条件，现代化不仅不能顺利进行，就连启动也很困难。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基本上是在农业文明发展的较高阶段上形成了这一条件。但在较低农业文明甚或前农业文明的社会，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现有的文明演进水平与近代民族国家建立所需要的条件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这些社会中，盛行的是部族政治，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就是人们活动的天地；同时，这种小规模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也是人们效忠的基本对象，而且国家的观念是淡薄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也可以在外来力量的作用下，建立起民族国家，但这样的民族国家往往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人们对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缺乏真正的认同，国家政权也缺乏有效行使的基础。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起点会对社会分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第一种类型的社会中，由于存在着较为稳固的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在社会分化中形成的各种专业化的群体会有利于政治资源的扩散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可以扩大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有利于政治稳定。第二种类型的社会却恰好相反。在这些社会中，种族的、宗教的、语言的种种差异使这些社会呈现一种高度的异质状态，彼此间的冲



第一种类型社会

突则构成对政治稳定的直接威胁。由于国家政权处于软弱状态，所需要的是政治资源的积聚，而不是政治资源的扩散。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分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社会分化会由于加剧社会的异质性而对政治稳定造成消极影响，同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民主化得以施行的条件。政治民主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较为复杂，虽然在这些社会中，政治民主化也有通过扩大政权合法性基础而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



第二种类型社会

但总的来说，在政治整合程度很低，有效的中央政权难以建立的社会中，民主政治往往对政治稳定起消极作用。

3. 现代化的阶段。现代化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会因一个国家所处的现代化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可以依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

自然也就不同。本文倾向于根据现代化不同阶段所承担的任务的不同，将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启动时期，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转型期，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任务的全面展开期，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成熟期。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上，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所面对的问题、所面临的环境都有所不同，因而现代化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就自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性质。

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就明显地随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而变化。如前所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同时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有些国家中，虽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但收入分配平等化的趋势并没有出现；相反，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说明了同时有多种影响这种关系的因素存在。而现代化的阶段即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

自从库兹涅茨的U型曲线说提出后，曾遭到许多批评。但客观地说，尽管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形，而且这个模型本身也确有一些简单化的地方，如果从总体上看，还是可以大体上看到库兹涅茨所指出的趋势。特别是从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更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趋势。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但阿德尔曼和莫里斯在70年代初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所做的研究也大体证明了这种趋势的存在。阿德尔曼和莫里斯在这次研究中共选择了43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研究这些国家在1957—1968年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情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是一种不对称的U型。较平均的收入分配是经济极端不发达和高水平经济发展都具有的共同特点。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之时，大部分是呈反比关系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较高速度的工业化、农业生产率的较快增长以及较高的增长率，这一切往往发生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低收入集团的收入分配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穷人，他们受经济发展不利影响的情况，因国家发展水平而异。在最低水平的发展中，由于扩大狭小的现代部门，经济增长开始于自给农业经济，因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大大加剧。但在一个国家中，一旦明显地超越二元发展阶段，中等收入者就是随后扩大经济增长基础的主要受益者。但最贫穷的40%人口的地位典型地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即使完成了从明显的二元增长过渡到基础更广泛的经济增长，即使达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程度和建立了基础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能力，人口中最贫困的阶层也只有在大力改进人力资源基础的地方，才能典型地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① 这项研究至少可以给人们三点启示。第一，U型曲线是存在的，第二，这个U型曲线是不对称的，第三，在经济

| 现代化阶段 | | 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 | 第三阶段 | 第四阶段 |
|-------|------|----------|----------|---------|-------------|
| 发达国家 | 经济发展 | 农业社会 | 资本积累 | 经济增长 |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扩大 |
| | 收入分配 | 较低的不平等 | 不平等扩大 | 明显的不平等 | 平等的趋势 |
| 发展中国家 | 经济发展 | 农业或前农业社会 | 二元结构开始形成 | 二元发展 | 二元结构的缩小或消除 |
| | 收入分配 | 较平等的分配 | 不平等扩大 | 中等收入者获益 | 平等的可能 |

增长的较后阶段，公平的收入分配并不会自动出现，而是需要创造种种条件。如果将之与发达国家的情形进行一下对比，大体可以印证现代化的阶段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

^① 阿德尔曼和莫里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斯坦福出版社，1973年。

4. 文化历史传统。一些同样的现代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不同国家中表现出不同的性质与特征,而且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还可以看出,这些关系的性质与特征的差异,带有很强的地区性。如前面所指出的,同样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东亚和拉美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而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在拉美国家之间,情况则较为相同或类似。同样的特点也可以从欧洲的现代化中看得出来。在欧洲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欧、北欧、南欧和东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在不同的地区内部也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这就使人们不能不去考虑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价值选择对现代化中不同因素之间关系的影响。

在这方面,亨廷顿等人已有较系统的研究。^①亨廷顿将目前世界的文化划分为9个文化群(见下表)。亨廷顿认为,这9个文化群虽然不能把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囊括进去,但至少可以包括世界上85%的人口。一些例外的情况包括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斯里兰卡、泰国、冈比亚、老挝、玻里维亚和危地马拉。也有的国家是横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如马来西亚和南非。当然,在同一种文化群的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的国家与此所处的文化群也有显著的差异,

| 文 化 | 主 要 宗 教 | 地 区 或 国 家 |
|---------|-------------|--------------------|
| 北欧日耳曼文化 | 新 教 | 西北欧、英国人定居的国家 |
| 拉丁文化 | 天主教 | 南欧、拉丁美洲 |
| 阿拉伯文化 | 伊斯兰教 | 北非、中东 |
| 斯拉夫文化 | 东正教 | 东欧、苏联 |
| 印度文化 | 印度教 | 印 度 |
| 中国文化 | 儒 家 | 中国(包括台湾)、朝鲜、新加坡、越南 |
| 日本文化 | 儒家、佛教、神道教 | 日 本 |
| 马来文化 | 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 |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
| 非洲文化 | 基督教、异教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如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但亨廷顿认为,同一文化群中的国家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发展的目标以及对现代化中不同因素的选择上更是表现出明显的共性。而在不同的文化群之间,这种差异就相当突出了。

亨廷顿认为,这种文化的差异首先集中表现在对不同发展目标的价值评价及选择上。比如在有的文化中,把富裕、平等、民主、稳定和国家的独立性看作是对人类最有意义的,因而应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朴素、不平等、极权、实行惩罚的、尚武的社会看作一个好社会,在非洲的一些部落文化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价值选择的存在。而在一些不同的文化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共同提倡的发展目标,亨廷顿认为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结果。

亨廷顿的这种观点无疑带有一定的绝对化的倾向。将不同文化中对发展目标的价值选择看作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之所以会存在一些共同的选

① 见亨廷顿前引文。

择,并不仅仅是由于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人类的一些基本要求是共同的或相似的。但亨廷顿的文化论给人的启示是重要的。如果忽视文化与历史传统的作用,就难以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现代化因素关系的差异做出充分的说明。如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差别,就深深地根植于两个地区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除以上四个因素之外,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也都会对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五、作为中介变数的政策与措施因素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由这些因素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也受其他一些有关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因素称之为中介变数。上面我们所分析的四个中介变数,以及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基本上可以说,人们既无法改变这些因素,也无法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中介变数。这种类型的中介变数不是既定的,而是由人们的自觉努力造成和改变的。这类中介变数就是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调整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消弥或减少其间的冲突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这类变数会对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实际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任何国家的政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采取各种政策与措施,以协调现代化的不同部分、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按亨廷顿的看法,这些政策和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顺序调整,一种是结构创新,一种是采取恰当的战略。下面将依据部分国家的具体做法,对这三种类型的政策与措施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第一,顺序的调整。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曾指出,从理论上来说,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总体性过程,但在实际的现代化进程中,却不可能将所有这些方面同时推进。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总是选择若干个方面,在这些方面中首先开始现代化的进程,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则要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提上日程。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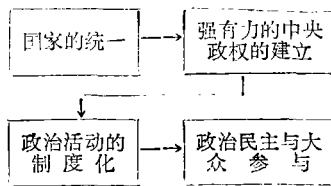
一般地说,在可以人为地加以控制的范围内,对优先顺序进行选择和调整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使优先开始的因素有利于后面因素的实施,而防止优先因素妨碍后面因素的情况的出现。在几百年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现代化不同因素之间的较合理的顺序关系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有:

现代化的政治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最为明显,得出的结论最为明确。拉斯托将这些政治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概括为:国家的统一→政府的权威→政治平等。他将这称之为“最有效的顺序关系”。^①诺德林格和亨廷顿认为在大众性的政治参与出现之前,要能够形成有效的政府制度(有效的政府制度→大众政治参与)。^②达尔认为,在政治参与扩大之前,要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竞争模式。^③将这几种观点

^① 拉斯托:《国家的世界:政治现代化的问题》。Brooking institecion, 1967。

^② 诺德林格:《政治发展:时间顺序和变化速度》,载《世界政治》第20卷第3号;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达尔:《多头政治:参与与反对》,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



加以整理即是：在这当中，国家的统一意味着一种有效的新政治共同体的建立，从而为全部政治现代化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化奠定基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则是启动经济增长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政治活动的制度化则为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顺序关系。经济发展方面的这两个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较不象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那样清晰。虽然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分歧远多于一致。一部分学者对经济增长给予特别的强调，并且认为，只有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的条件才能出现。巴西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政策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同时也有相当一批人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增长第一的战略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从长远来说，则会对以后的经济发展形成消极影响。他们主张，在经济发展中应首先考虑收入分配问题，特别是应首先考虑资产（如土地）的公正分配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出现持续的经济迅速增长。还有人提出，应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同时并重，即“边增长边分配”。这些争论在目前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成果。其原因可能在于这种关系本来是因具体情况而不同。特别是一个国家的资源丰裕的程度会对这种关系形成极大的限制。但从实践上来看，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一种共同的趋向，即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对收入分配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但最终的结果会如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也许这会对今后这方面理论的成熟提供可能。

工业化与社会现代化的顺序关系。阿普特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社会现代化^①的关系是不同的。他认为，在西方，是商业化和工业化导致了现代化，即在经济商品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里，现代化则是由经济上的商业化和政治上的科层制的发展促成的，并在此基础上诱发了工业化的过程。概括地说，在西方现代化以工业化为先导，在其他地区则是现代化导致工业化。^②

第二，结构的创新。

在上一部分中我们曾经指出，不同的文化，特别是不同的价值体系，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现代化因素的选择。但要在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中尽可能协调互相矛盾的现代化因素之间的关系，还必须有结构创新。也就是说，必须形成一种可以对不同现代化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的结构。

如前所述，同样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收入不平等的奇迹，而东亚则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收入的较公平的分配。这在一定

^① 这里阿普特所使用的现代化的概念是狭义的，是指除工业化以外的社会变迁。而我们在文中讲到的现代化，则是指包括工业化在内的总体性变迁过程。

^② 转引自劳厄：《社会变迁之探究》，复旦大学油印本，下册，第117页。

意义上反映了两个地区价值选择上的差异。但价值选择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要使主观愿望变为客观现实,还必须创造现实的条件,即结构创新。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妥善解决劳动就业问题,重视农村的土地改革,大力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发展教育事业,扩大人力资源的基础等诸如此类的结构调整,都对协调增长与分配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在这当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创新将特别重要。

在政治领域中,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了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与政党制度的特征有直接关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来看,强有力的一党制或两党制要比多党制更有利于政治稳定。从而在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中,不致出现较严重的政治动荡。

第三,适当的战略。

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道路与途径等。因此,制定恰当的发展战略,是协调现代化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化解其中的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

仍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的关系为例。新加坡的周孙铭根据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指出:“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依赖于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经济增长来自几个部门,并集中在几个大企业和外国企业,那么,收入不平等就会扩大。另一方面,如果中小企业成了增长源,这一增长具有广泛的基础,那么,收入平等将会得到实际地改善而非进一步恶化。”^①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拉丁美洲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形成的对照似乎可以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

同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也会对这一关系形成重要的影响。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量引进外国“最新的”、“最机械化的”、“最自动化的”高精尖技术。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引进这些最先进的技术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种种问题。其中的问题之一,就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些技术大多是资本——技术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正是有鉴于此,一些发展中国家从70年代中期开始,对科学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开始强调发展“中间技术”、“适用技术”。因为中间技术和适用技术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样,就可以在技术费用限定的情况下,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当然,这种技术战略的转移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如果从扩大就业机会,促进收入平等分配,从而协调增长与分配的关系来看,其积极作用无疑是明显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本文算是一个初步的探讨,目的在于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李国庆

^① 周孙铭:《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载《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9期第26页。